

王春法 著

国家创新体系与 东亚经济增长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点研究课题

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 经济增长前景

王春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王春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3

ISBN7 - 5004 - 3288 - 7

I. 国… II. 王… III. 国家创新系统—应用—经济增长—研究—东亚 IV. F1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6775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05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课题是我独立主持的第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也是我运用一种特定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某种经济现象的第一次尝试。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引起广泛争议的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以后，国内经济学家一片反对之声。许多学者认为克鲁格曼无视东亚经济增长的独特性质，低估了东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并指出东亚经济增长至少还可以持续20—30年。但是，国内外也都有一些经济学家赞成克鲁格曼的分析，认为他的分析切中东亚经济研究的时弊，值得我们深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97年3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提交了一份名为“克鲁格曼命题分析”的课题立项报告，希望能够对克鲁格曼文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即东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一些深入的分析，并以此避免简单的是非之争。但是，院科研局经过研究之后，将我申报的课题更名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克鲁格曼命题研究”作为副标题，并于1997年8月正式批准立项。现在想起来，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而且重要的更正。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最初的课题设计，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分析应该是我们分析和解释的重点。但是，正当课题组成员致力于克鲁格曼命题的研究，并根据最初的课题设计提交了第一批研究报告的时候，从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东亚其他国家及地区，从而造成该地区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从克鲁格曼的批评者转变成为颂扬者，认为他对东亚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克鲁格曼命题也就成为决定课题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由于形势的变化非常快，对于东亚经济前景的任何分析都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而且，仅仅将课题研究局限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对东亚经济奇迹的理解、解释必须将东亚危机的爆发包括在内。有鉴于此，我决定对课题的研究方向进行调整，将重点从克鲁格曼命题的分析转到对东亚经济前景的分析上来，并以东亚经济增长的科学技术基础作为分析的突破口。恰值此时，我获得了前往美国进修学习一年的机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这个课题作为我进修学习的主题。

早在赴美之前，我已经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并且参加过国家科学技术部的一个相关研究课题。在美国的一年中，我又系统地接触了国外有关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最新进展。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并没有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作为分析东亚经济增长前景的工具，而只是把它作为考察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视角。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有关学习、国家专有因素、系统失败、知识流动等方面的论述在分析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以及解释东亚危机的爆发方面很可能有着独特的理论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有意识地将研究重点转向国家创新体系理

论以及东亚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及其特点，并据此分析东亚经济变迁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使用一般常规分析方法无法观察或解释的经济现象，比如说东亚区域创新体系的存在与东亚经济增长的群集性、东亚地区多个国际生产网络的重叠与技术扩散、东亚电子工业的崛起与东亚奇迹之间的密切联系、电子工业中的技术学习、美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技术竞争等。对于这样一些问题，运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都有可能给以比较明确合理的解释。比如说，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国家专有因素对于东亚地区的技术学习有着直接的决定性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种技术学习的成败、速度以及规模等，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影响到技术学习的方向选择。与此同时，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系统失败又对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负有重要责任，因为成功的技术学习使它们很快就遇到了技术赶超陷阱的阻碍。如果说，在经济赶超的情况下东亚各国及地区还有一个追赶的目标和方向的话，一旦它们赶上或者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那么，这些国家在产业技术发展上就会陷入一种迷茫的境地：既不知道未来的经济技术发展之车将开向何处，更不知道它将以何种速度和规模向前行进。与此类似，政府也失去了在赶超时期的那种指导功能，无力提供正常的经济技术指南，因而听任国民经济的泡沫化。既然如此，我们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前景也就非常明确了：如果不能及时地采取得力措施克服追赶陷阱的阻碍，则即使它们在短时期内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东亚地区的长远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好在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开始采取措施加强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以求尽快跨越追赶陷阱，走上经济的持续增长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说，这项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杜方利研究员、宣杏云研究员、刘秀莲副研究员、何勇田助理研究员（现在美国学习）以

及中国银行的温斌博士等为课题研究提供了五份分报告，^① 他们的部分观点和材料在课题成果中也都有所体现。当然，作为课题主持人和研究报告的撰稿人，文中的所有错漏之处均应由我个人负责。

王春法

二〇〇〇年六月

① 这五份分报告分别为：“东亚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杜方利），“东亚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宜杏云），“东亚国家（地区）与前苏联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刘秀莲），“资源环境问题制约东亚的可持续发展”（何勇田），“贸易自由化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温斌）。



作者简介

王春法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主任。山东省乳山市人，1963年11月生。1981年入兰州大学学习，1988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有专著5部，译著1部。目前的研究方向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科技全球化的主要形式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新经济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挑战等。

责任编辑：罗 莉
平面设计：王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项目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1)
第一节 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解释	(1)
第二节 克鲁格曼命题	(9)
第三节 对东亚经济的分析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20)
第四节 关于本书的结构	(25)
第二章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27)
第一节 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渊源及其提出	(28)
第二节 国家创新体系的本质内涵及其结构	(45)
第三节 国家创新体系的方法论意义	(66)
第四节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对东亚经济研究的含义	(72)
第三章 论东亚地区的国家创新体系 (NIS)	
——以韩国为例	(77)

第一节	东亚地区的科技状况	(79)
第二节	韩国的国家创新体系	(113)
第三节	东亚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	(194)
第四章	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变迁	
	——以电子工业为例	(225)
第一节	东亚经济增长的技术因素	(225)
第二节	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电子工业的崛起	
	——对东亚地区电子业国际生产网络的微观分析	(253)
第三节	对东亚经济危机的另一种解释	(330)
第五章	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对中国	
	的含义	(354)
参考书目		(374)
附录	亚洲奇迹的神话	(385)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学研究中，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现象的具体分析无非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对这种理论进行检验，即用经济发展的现实来验证或者是证伪该经济理论；其二，深化对某种经济现象的认识，即在该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该经济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索，使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准确，从而为进一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改进经济运营实绩探索新的方向。在这里，无论是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还是经济现象的选择都是长期思考的产物，是理论研究和经济现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运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来研究和分析东亚经济增长的前景呢？换言之，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呢？

第一节 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解释

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特征。^① 迄今为止，这种以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为特征

① H.J.Habakkuk and M.Poston [1965]: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VI, Part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

的经济增长只在两个地区出现过：其一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拉美部分地区所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结果，而且这些国家在本质上也是由欧洲移民在欧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放大和延续。其二就是东亚地区。这是一个与欧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的地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从 60 年代以来，这个地区所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却与欧洲的发展历程并无二致。为什么这种持续的经济增长进程会在东亚这样一个离欧美比较远、受欧美文化影响也相对较小的地区出现？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持续经济增长现象在这一地区的产生？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从 80 年代初期即开始进行研究，并且陆续提出了“战略论”、“政策论”、“体制论”、“文化论”等迥然不同的解释。^①

所谓“战略论”，即认为东亚经济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东亚地区有关政府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且因地制宜地对这种发展战略进行了适时适度的调整，从而促成了该地区各主要经济体持续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四小龙’的成功，最重要的一条是它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把握住了在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根据国（岛）内基本情况与国际环境的变

① 用国际货币基金一位研究人员的话来说就是：人人都同意在过去的 30 年中东亚地区、特别是“四小虎”取得了非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关于出现这种高速增长的原因人们却从来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参见 Michael Sarel: “Growth in East Asia”, IMF 1996。

化，及时制定实施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① 在他们看来，无论是 50 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还是 60 年代以后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都是符合东亚经济发展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因而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这些国家在 60 年代初期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两者衔接的火候适宜，堪称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典范。总之，“发展实践表明，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四小龙’经济成功的奥秘之所在”。^②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出口导向工业化促成了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调整增长，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③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贸易和出口中令人难忘的成就，说明它们靠制定各种最可行的发展战略，包括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增值产品更好出路的政策，从而克服了有限自然资源的约束。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确实受惠于有利的时机，它们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时机进行迅速的工业化起飞”。^④

所谓“政策论”，即认为东亚经济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实施了一些基本原理正确的经济政策，包括尊重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适当的政府干预等。这种观点在世界银行 1993 年发表的《东亚奇迹——公共政策与经济增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份著名的政策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明确指出：“表

① 谷源洋、周圣葵、谈世中：《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 页。

② 同上书，第 14 页。

③ 郑敦仁：“政治体制与发展战略：韩国和台湾地区”，载加里·杰里菲、唐纳德·怀曼编：《制造奇迹：拉美与亚洲工业化的道路》，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载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现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PAEs）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使政策基本面正确来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在谈到韩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把韩国的成功归功于韩国政府所起的开发作用。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奇迹来自政策奇迹。政府预见到要出现一个奇迹，于是提供了一个政策环境，但是使奇迹成为现实的是工业”。^①那么，是哪些政策促成了东亚奇迹的产生呢？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国家及地区的政策选择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基本政策和选择性干预。最重要的基本政策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对人力资本的高投资以及稳定可靠的金融系统，有限的价格扭曲，对外国技术的开放等。选择性干预包括温和的金融抑制、直接信贷、有选择的产业促进以及出口推动型贸易政策等。就前者而言，“基本原理正确的发展政策是东亚经济得到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宏观经济管理通常是很好的，而且宏观经济政策通常也是稳定的，这为私人投资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框架。促进银行系统融合并使之更易于为非传统储户所利用的政策提高了财政储蓄水平。重点放在初中级学校教育的教育政策使劳动力技能迅速提高。农业政策则强调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并且对于乡村经济不过多地征税”。然而，“这些重要的政策措施并不能解释东亚成功的全部故事。在这些经济体中，大多数采用政府干预——系统地并且是通过多重渠道——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促进特定工业的发展。政府干预采取了多种形式。支持储蓄、构筑强有力的金融市场、促进均衡投资等政策，包括保持低储备率并且维持贷款利率的上限以增加利润和保持收入，建立并且在财政上支持政府银行，公私部门广泛地分享信息等。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确定并且为选定的工业部门提供补贴性信

^① 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贷，保护国内的进口替代工业，支持衰落性工业部门，并且确立针对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出口目标”。由此可见，“东亚奇迹——在均等的前提下取得高增长——是由于基本原理正确的发展政策、精心的干预以及非常迅速的实物和人力资本积累三者相结合的结果”。其中，较高的投资率以及由于初级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源禀赋持续增加相结合，可以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余三分之一可以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HPAEs成功的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正确运用基本政策是关键；第二，它们都得益于谨慎的政策干预。而且，“迄今为止，出口推动战略一直是基本原则与干预政策最成功的结合使用方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最重要的借鉴意义”。^①

所谓“体制论”，即认为东亚奇迹产生的根源在于该地区有关经济体建立起了一整套适合本地特点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强力的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②东亚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这种观点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极为流行，并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在80年代中后期，人们比较强调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其理论基础是政治学中的所谓“新权威主义”。在这些学者看来，“不

①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epared by a team led by John Page and comprising Nancy Birdsall, Ed Campos, W. Max Corden, Chang-Shik Kim, Howard Pack, Richard Sabot, Joseph Stiglitz, and Marilou Uy. 事实上，即使是政策论者，长期以来也一直围绕着究竟是市场机制还是国家干预促成了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世界银行1993年的研究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两种观点调和的产物。

② 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